

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

乔瓦尼·莱维

【译者按】意大利著名微观史学家,微观史运动发起人之一乔瓦尼·莱维教授于2011年撰写此文,全面反思三十年来意大利微观史研究兴起与发展中出现的争议与问题。作者将微观史的兴起与意大利现实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紧密相连,指出微观史的产生是历史复杂性分析的需要,它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其研究目的在于重构和还原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作者修正了长期以来对微观史的一些片面认识,微观史不是专门研究典型而独特历史事件的研究方法,也并不排斥宏观的历史叙事,更非意大利所特有的研究主题。微观史作为解决历史事实与认知偏差之间永恒矛盾的方法之一,在新世纪仍具有推动历史研究发展的极大潜力。

迄今为止,微观史所引发的误解也许比其他任何史学研究方法都要多。微观史的广泛成功无疑源于它对史学界不满情绪的积极回应,这种不满情绪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日益喧嚣尘上,并在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身上表现得更为多样,甚至极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再同情那些对“整体史”(storia totale)失去信心的研究者,以及对重构历史事实的可能性产生怀疑的研究者;相映成趣的是,其中的少部分人同时也开始与那些认为历史事实只能通过理论概念来进行解读的研究者渐行渐远:因为这些研究者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将历史现象的研究局限于因果关系的分析。这种阐释问题的方法与手段,甚至成为意大利左翼史学根深蒂固的弊病。因为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的魅力在于找到了阿利阿德涅的线团,顺着这一线索可以找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的答案。这种放弃思考各种问题及其复杂性的态度,这种将一切历史固化在既定观念的态度不仅在意大利政治上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更影响了意大利对于历史的解读。

当然,对微观史的误解也源于它的称谓,与其说微观史被定义为一种史学方法论,一种对某一点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深入集中的观察,不如说更适合于指对细小的事物,细微的事

* 原文题目是 *30 anni dopo. Ripensando la microstoria*, 后以英文版收录于论文集《历史的认知:探寻理论、方法与证据》(S. Fellman, M. Rahikainen, eds.,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Quest of Theory, Method and Evidenc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p. 121 - 132.), 英文版标题改为《微观史与复杂性的复苏》(*Microhistory and the Recovery of Complexity*)。本文译自意大利文版,参照英文版审校。

件和人物的关注。因此,微观史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与这一时期一系列的史学争论相关,在不同的场合它也被称为“叙事史的复兴”(rinascita della narrazione)或者“事件史的回归”(ritorno all'avvenimento)。但如果仅从这一点出发,不仅是对意大利微观史学的误解,同样更是对意大利历史研究者,及其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历史事实与史学写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外部世界”的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种歪曲。

尽管有诸多不同的态度和动机来歪曲和误解微观史,但倡导和发起微观史运动的意大利研究者却有一个共识,即相较于方法论问题,他们更关心微观史的研究主题。这样一来,关于微观史,目前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解读:一种是回归到更加传统的历史理论,即内容高于方法;另一种则更强调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和认知层面的讨论,即某种程度上的方法高于内容。首先,我以彼得·伯克为例,尽管他的著作多数是关于宏观历史,但他也对微观史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通过他大力宣传的有关自己关于“语境”(contenuti)的阐述,为微观史方法论研究作出了贡献。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将微观史概括为以下三点:

1. “‘微观史’定义中的所谓‘中间路线’,是指那些为了阐明更大问题而对地方或小范围领域所进行的研究……这一点,套用汉斯·梅蒂克(Hans Medick)的话来说,就是将地方史视为一般的历史……对一个共同体进行的研究。”2. “微观史的第二个变种可以被称为‘微传记’,即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历史个体的传记”。3. “微观史的第三个变种是对小规模事件展开叙述的历史,这种事件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有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种所谓的‘叙述史的复兴’同样也为微观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同时,在伯克看来“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相信宏大叙事的可信度,无论是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对……结构性的批判,还是对个体的强调”都与微观史的兴起紧密相连。^①

因此,伯克关于微观史的新颖之处及其特点的诸多理论,通过他的“语境”,通过他自下而上的历史观,通过他对个人和事件的关注传达了出来。伯克的这一理论还暗含了对认知能力的批判,即历史理应在大的意识形态危机出现之前就被认知。这种批判表现为对追寻历史真实的不信任,以及对历史叙事与历史虚构分道扬镳的怀疑。当然,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当微观史作为一种标签,已经逐渐成为大量零碎著作的概称,这也与上述伯克的定义相吻合。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在微观史研究领域,一群意大利历史学家的经历则完全不同。

我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一个强烈个人色彩的微观史印象,但我认为许多微观史学家也可能持同样观点,即政治是微观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首要原因。当时正是意大利左翼陷入消沉的低潮年代,各种危机和可怕的事件接踵而至,但从未得到解决。1968年酷热的秋季过后,从保守主义的复辟到恐怖主义袭击,再到对工会运动的镇压,以及拒绝他们组成议会和平均主义的政治诉求,均显示出意大利进步势力的软弱及其政治分析能力的局限性和惯性。产业工人阶级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意大利左翼兴起的渊源,扎根于意大利固化的社会结构之中,意大利左翼依据政治和意识形态自动选择机制,完全以阶级成员为纲。但

① 彼得·伯克:《创造微观史》(P. Burke, "The Invention of Micro-history"),载《经济史月刊》(新系列)(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Nuova Serie)2008年第24期,第262—264页。

面对这种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变化,他们简单化的阐释开始暴露其本质上的空洞与贫瘠。这一点在历史编撰中显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关于工人运动的历史,还是关于意大利经济畸形发展历史的解读。

二

就我而言,微观史的产生是回归复杂性分析的需要,因此也是放弃概略性和一般性解读的需求,从而更准确地认清行为模式、抉择与合作的起因。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反映了这种趋势,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开始,到作为先驱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是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又如以克莱德·米切尔(Clyde Mitchell)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人类学家,以及独立但富有创新性的研究者,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国内的学者,如爱德华多·格雷迪(Edoardo Grendi)、卡洛·彭尼(Carlo Poni)和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他们作为《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杂志的编审专家,与我一道通力合作,开始探讨所谓“复杂性的复兴”(recupero della complessità)这一问题。

因此,1980年至1981年,在出版商伊诺第(Einaudi)的支持下,“微观史”丛书系列诞生。在这一系列的开头,以我的名义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但这一声明实际上是我同其他学者,最早是与金斯伯格(后来我们成为这一系列的主编)共同讨论的产物。我认为在当时这是一次良机,是一次能使那些在各种研究和讨论中被无故忽略的文献资料重见天日的好机会:

“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讨论他们自己的分类方法,正如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小说《蓝花》(*Fiori blue*)中的奥热公爵(Duca d'Auge)一样。当他询问比罗同神父(Don Biroton):

‘能告诉我那个巴塞尔会议是世界史(storia universale)吗?

——确实,总的来说,是世界史。

——那我的教会法呢?

——是一种特殊的总体史(storia generale)。

——那我女儿的婚礼呢?

——这只能算是事件史(storia événementielle),或者充其量算是微观史(Microstoria)。

——那究竟什么是历史?(奥热公爵惊叫道)这到底算哪门子语言?今天是什么日子?圣灵降临节吗?

——请息怒,公爵大人。我只是有些疲倦了。’”

这个充满了对等级制历史的嘲讽以及神父种种不耐烦的故事,当然与“微观史”系列诞生的动机有所不同。排斥事件史,青睐将历史现象结构化的争论已经年累月,但问题始终存在。如何在不忽视个人和社会状况的情况下实现一种普遍性的概括?或者反过来,如何在描述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同时不放弃对普遍问题的理解,不落入类型学说或典型事例的窠臼?

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面对一批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主题时历史学家时常有所不满。但这样一来的后果也是令人惋惜的:在历史编撰中忽视平民大众、妇

女、口头文学、日常生活、边缘世界以及异族社会。当然,我也并不想置身于这些抱怨之外。但目前还难以仅仅为了将某个特定的人纳入历史叙述的范畴而涉及该个体自身,并展示其历史存在感和重要性。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论述方法。

因此,微观史首先应被视为一种叙述方式的新尝试,但并不排斥史学家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当然,这不仅仅是指参考文献的引用,因为这应是基本专业素养的一部分。但随着这项尝试逐步展开,历史也正在被构建: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这种方法能够形成问题并寻找到问题的答案。所以,这项试验性的工作没有理由再保持神秘,正如餐厅大厨的烹饪方法不应该始终是秘诀一般。因为,可能真正从历史学家视野中消失的并不是那些被忽略的事件主角,而是那些被各种沉重的一般性诠释压垮的读者,他们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在这些放弃消费历史书籍的读者看来,简单化的因果机制论和僵化的马后炮是这种研究类型遭到谴责的罪魁祸首。

但微观史并非必须研究那些被排斥的、弱小的群体或者偏远人群的历史。微观史更希望去重构历史中的某些时段、社会状况和个体民众,通过研究分析,还原某一特定地区的风土人情;不是在缺乏更好的一般化解释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典型事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当地纷繁复杂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体来进行考察。

如此一来,微观史的研究范围相较于传统的历史研究大为缩小,直接导致我们对本专业的概念方式产生质疑:为了能经受住各种典故和隐喻长期的考验,这些概念不得不如同涂满防锈漆一般的模棱两可。正如我们总想着能找到某种方便的定义,可以经常抛出来用以解释任何与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或者任何与社会分层和权力结构有关的现象,如流行文化、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专制国家和农民阶级。尽管这种定义方式有其用武之地,但如今这些定义和概念更需要通过将抽象的个体重新还原到具体历史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深入阐释和论证。只有充分了解这一个体所从属的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具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他(或她)为社会变革而作出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努力。

因此,在选择微观史系列这一标题时,我们从两种基本研究方法出发,探讨影响社会问题的诸多因果机制。第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有意隔离的规范性制度(如劳尔·梅扎里奥作品中的族间联姻法^①),这一制度无意试图含沙射影地解释整个社会,这就如同意味着将一块拼图隐藏于研究者和读者的视线之外,这块拼图也许需要被放置在整个背景下才能明白其功用,但在这里它则被置于真空的环境中进行实验。另一种方法恰恰是研究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各种人或事件,即在自由选择与约束限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之中,个人与团体是如何在诸多矛盾的规范性管理制度的夹缝中生存生活。这些选择和矛盾是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不能作片面的认识,如假设一个静止而稳定的政权,排除一些在特殊情况下的公开叛乱,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对一系列连续性矛盾冲突结果的解读,来衡量其影响。这种司空见惯的常态成为历史的主要特征,而特殊个体的生存状况成为我们尝试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聚焦中心。

① R. 梅扎里奥:《紧张的国度:15—18世纪科莫解决离婚的婚姻法规》(R. Merzario, *Il paese stretto. Strategie matrimoniali nella diocesi di Como, secoli XVI - XVIII*),都灵1981年版。

但更多时候,对历史的解释还是流于简单化的因果机制分析,习惯于将历史描述成一个由必要的生态、政治和经济所构成的残酷机制。由此形成的进化论观点,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并有人为其辩护。在这种背景下,上述的两种方法除了能找寻更多有关各类社会状况的文献记载和矛盾运作规律之外,还试图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视角。作为社会史复兴的开山之作,E. P. 汤普逊在其著作中回应了一些坚持把人描述为“被困境所束缚,被专制所怜悯”的观点。^①

三

这样一来,研究的关键词就变得明显了:运用透镜或显微镜、进行试验、语境分析、复杂性、选择、制约、差距、冲突和观点。相较于理论,这更应当被视为一系列的实践和方法。尽管微观史学诞生于世界史学发展的敏感时期,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微观史作为一个分水岭,展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时代特征。这些时代特征还包括苏维埃政权正遭遇的紧迫危机,两极格局结束所导致的冷战世界体系的瓦解,它们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争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混乱,还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社会史,特别是热衷于谈论“转折点”问题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印度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运动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印度的“庶民研究”随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转而采用诸多复杂的后殖民研究方法。文化主题通过稳步蚕食与解构主义相伴随的相对主义怀疑论,逐步成为历史研究所关注的中心,甚至成为辨别历史书写与虚构的标准。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本身失去了其在人文科学中的中心地位,因为当人们缺乏对未来的憧憬,将目光聚焦于过去无疑是困难的。另外,历史学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失去其从未被动摇过的中心地位,因此当其他人文科学尝试在争论中解决诸如认识经济学理论中不完整和非统一性、质疑人类学研究者的权威、个体身份的模糊性,以及人的非线性特征如何体现在文学理论和小说里的人物中等问题之时,历史学明显反应迟缓。与此同时,当面对大众媒体乐于对历史进行肤浅的和快餐式的解读之时,新兴的公众史学也悄然改变了其研究目的,这一切都在提醒着历史学,如不经历一场深刻的剧变,那种必然缓慢的研究节奏和认真重构历史事件所必需的复杂性将无法应对时代发展的需要。此外,读者也在不断减少,人们更多的被图像而非文字,网络而非书本所吸引。这种动荡的状况想获得新的平衡仍有待时日。

而且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受制于多方因素,连微观史本身也经历了诸多改变,如歪曲的阐释和过度简单化。但它依然坚持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并且获得了持续的共鸣,这一点在我看来,是由于微观史比传统史学在满足年轻的研究者和新读者的新需求方面更为敏锐。特别是微观史的研究目的并非展示历史中普遍的缺陷,而是历史学家可以也必须概括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抛开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后,仍然可以反映个体事件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当置身于一个不再相信普世的共同真理真实存在的世界之中,研究人类的组织原则,探寻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是微观史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不断追问的难题。

^① G. 莱维:《微观史:一项建议》(G. Levi, "Microstorie: una proposta"),载《伊诺第公报》(*Bollettino Einaudi*),1981年,第14页。

四

因此,了解微观史的具体特点,在我看来比仅仅遵循新的研究课题,或者拒绝综宏观与综合的历史研究更为重要。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微观史定义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即在坚持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的同时,保有从特定事件中进行一般化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始终是聚焦具体事件,并归纳其产生的问题而非其结果的科学。相同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社会背景环境下,但结论不会是类似的,这些问题只是为了用于找出具体事件的有效答案。因此,历史是从研究某些或某一具体事件开始,在保持其特殊性的基础上,找出与历史事件阐释的社会背景相对应的普遍性问题。这里我举一个稍显自相矛盾的例子:弗洛伊德在诸多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但当需要为不同的个案找出适用于它自身的解决方案时,却无法断定这一情结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二)因此,微观史所寻求的不是典型性或象征性的个案事件,如果我们否认典型的社会背景、典型人物或典型场所,则意味着对历史真实的背叛,因为在这里,我们所指的典型是指一旦开始研究某一典型事件,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被其他事件所启发,类似的事件也会接踵而至。不存在典型的案例,只可能存在一般相关的问题。正如达尼埃尔·罗什(Daniel Roche)在《梅内特拉:生活日记》(*Journal*)^①一书的导言部分所强调的那样,梅内特拉(Ménétra)并不典型,作者试图通过将所有个人的和特殊的兴趣从梅内特拉的生活中剔除,来展示一名乡村工匠(*compagnonnage*)的典型特征。甚至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村落也不具有典型性,无论是冈萨雷斯(Gonzales y Gonzalez)研究的圣何塞的格拉奇亚村庄(San José de Gracia)^②,或拉杜里(Le Roy Ladurie)^③笔下著名的蒙塔尤(Montaillou),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被怂恿去低估当地农民为了维护其异端宗教信仰而遭受暴力镇压的真实历史,其目的在于将研究重心聚焦于展示当时这些村落典型的农民共同体形象。

(三)当然,微观史并不排斥宏观叙事,对小范围事件或人物历史的关注也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般真理的探寻。这并非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论调,恰恰相反,正是宏观叙事背弃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面,转而采用归纳推理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式来寻求普遍适用的规律,而忽视了相关的真实事件和人物。布罗代尔对“事件史”(événementielle)的排斥,与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对社会人类学的定义不谋而合:“一个社会结构的连续性,如同一个有机体结构,是不会被其组成单元的变化所破坏。个人可能会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离开这个社会,但其他人也可能会加入进来。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维系着整个社会结构的

① 达尼埃尔·罗什编:《我的生活日记:雅克-路易斯·梅内特拉日记汇编,18世纪的乡村玻璃工匠》(Daniel Roche, ed., *Journal de ma vie. Edition critique du journal de Jacques-Louis Ménétra, compagnon vitrier au XVIII^e siècle*),巴黎1982年版。

② L. 冈萨雷斯·Y. 冈萨雷斯:《城市的边缘:圣何塞德格拉奇亚的微观史》(L. Gonzales y Gonzales, *Pueblo en villo. Microhistoria de San José de Gracia*),墨西哥1968年版。

③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14年奥克区的乡村》(E.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14*),巴黎1975年版。

连续性。”^①因此,微观史并非是通过观察一般的社会背景来抽象出历史事实,而是尝试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设立一系列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能使我们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部分性地保留包含全部真相的重要细节片段。

(四)最后一点,微观史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宏观解读强调线性度、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甚至在传记中都力图传达出一种给出完整信息的印象,或者至少是权威的、连贯性的和包容性的作者观点。我认为,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目前微观史正在为对抗史学的急剧衰落而努力,试图恢复历史研究的不确定性、不一致性和非线性的特点。看看经济学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如何修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们在理性、目标和获取信息的途径方面与我们或多或少处在类似的水平。如今,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构建出这样一个经济理论,使其能将所有关于理性、愿景、需求、欲望和个人价值的极端差异都计算在内?

(五)因此,微观史的兴起在于其意识到了人的认知偏差与历史真相之间的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史无限期推迟寻找历史真实的方法,相反,微观史始终保有进一步讨论和其他解释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方法是微观史学家工作的核心。对事实细致入微的观察,可以让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扩展我们理解事实的广度,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因此,微观史并不拒绝宏大叙事,而是在细致审视它们的同时纠正其简单化的毛病,修正其观点和设想。此外,还有一点历史学家必须时常铭记,并将其作为研究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即历史文献并不代表整个历史,因为历史文献常常是不完整的,并伴有许多谬误。正如金斯伯格所言:“20世纪70年代末,抱着实验的态度,一群意大利微观史研究者聚集到了一起……这种态度源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对所有时段所展开的研究都是构建(costruite)出来的,缺乏史料(date)支撑……但这种对植根于研究中的构建时机的强调也伴随着对怀疑主义论调(如后现代主义)的明确拒绝,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②

(六)接下来,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下微观史的兴起与政治批判之间的密切联系。意大利国内的左翼批判势力源于一群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源的历史学家,但他们常常游离于意大利共产党之外,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在共产主义发展史上,他们都被视为支持自由社会主义的左派保守主义人士(现在也被定义为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士)。然而这种过于意大利式的紧密联系,由于要追溯到意大利的激进主义运动(Azionismo)和卡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因此非意大利读者可能难以完全理解。

(七)“然后是一些关于微观史特征的常见问题和定位,包括研究规模的缩减,关于理性的争论,作为科学范式的细小线索,特定人物或事件的作用(但并非作为社会的对立面),对记录和叙述的关注,对历史语境的具体定义以及拒绝相对主义。”^③这是我1991年

① 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科学中的功能概念》(A. R. Radcliffe-Brown, “The Function Concept in Social Sciences”),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5年第37期,第5页。

② 卡洛·金斯伯格:《微观史二三事》(C. Ginzburg, “Microstoria: due o tre cose che so di lei”),载《历史手册》(Quaderni Storici)1994年第86期,后收录于《线索与印迹:对、错、伪》(Il filo e le tracce. Vero, falso, finto),米兰2006年版,第266页。

③ G. 莱维:《论微观史》(G. Levi, “On Microhistory”),载彼得·伯克主编:《历史写作的新视野》(P.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剑桥1991年版,第110页。

撰写的一篇文章的大意,目的是说明无论微观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态度相距多远,也无论微观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来说性质是一样的。

因此,回到彼得·伯克的观点,非常明显,我认为他关于微观史特征的观点不仅是对微观史的歪曲,他归纳的微观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也与我们实际的研究目的和工作状况相去甚远。“微观史是一个极其意大利式的主题,它与对故土的忠诚紧密相连,有时也可以称为乡土观念(*campanilismo*)。”因此,对他而言,研究一座村庄或一个人物成为微观史兴起的一种心理动机。他还认为“对历史上的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引发了一种怀旧之情,以及对现存乡村共同体的关注……”,他甚至指出,“对小规模事件的历史叙述常常被新闻工作者称为‘个人志趣的故事’,或多或少是为了作者本身而叙述,并常常将历史与侦探故事或者戏剧联系起来以提高吸引力……不少的微观史作品都带有浓郁的性和丑闻气息,有些甚至还冠以一个轰动性的标题……”^①

在本文的最后,我必须指出现在的微观史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讲,仍处在争论的中心,阅读此文的读者将来也许就会在其他的书或者文章中发现与我相同和不同的观点,对此争论我表示强烈的赞同。我还想进一步提及两部重要的著作,它们之间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均为我的这次讨论作出了贡献:一部是“微观史之父”爱德华多·格雷迪的论文《微观分析与社会史》,^②另一部是恩里克·埃斯帕达·利马近期出版的专著,该书对微观史的特征、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的研究也许是目前最为全面和睿智的。^③ 写作这篇文章也是为了纪念一位刚满60岁的朋友,这可能也会让我重返这一有些乏味的争论中来。虽然我认为微观史仍能为历史研究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在当今这个持续变动的世界中,历史的碎片化和史学作用的不断弱化日趋明显。同样,书籍的中心地位也被大众媒体所提供的更花哨的娱乐方式所颠覆,时代的高速发展和日趋简单化与我们所追求的缓慢和复杂化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反差。不过,马蒂·佩托恩(Matti Peltonen)仍然非常认真地从事着微观史研究,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将意大利的微观史研究传播到芬兰,尽管我稍显悲观,但仍希望他至少从中发现一些有趣之处。

(译者尚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邮编:430072)

(责任编辑:刘 军)

(责任校对:张旭鹏)

① 彼得·伯克:《创造微观史》,第263—264页。

② 爱德华多·格雷迪:《微观分析与社会史》(Edoardo Grendi, “Micro-analisi e storia sociale”),载《历史手册》(*Quaderni Storici*)1977年第35期,第506—520页。

③ 恩里克·埃斯帕达·利马:《意大利的微观史:标准、证据和独特性》(Henrique Espada Lima, *A micro-história italiana. Escalas, indícios e singularidades*),里约热内卢2006年版。